

中美博弈下第三方立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韩永辉 张帆 王贤彬

【内容提要】 争取第三方国家的外交支持是中美博弈的焦点,而东道国的立场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OFDI)的重要因素,需在中美博弈框架下审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外交立场选择所产生的效应。本文基于中美大国角力的视角,采用 2005—2020 年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识别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两国间外交立场的动态变化,并捕捉这种立场抉择对中国在当地 OFDI 的影响。研究发现:(1)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对华更亲近,会有利于中国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2)当第三方国家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时,其对华疏离、对美亲近反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 OFDI,亦即存在部分第三方国家利用中美博弈对华“投资勒索”的现象;(3)相较于非“一带一路”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的外交亲美立场更能显著抑制中国 OFDI;(4)当东道国为中等收入国家、非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国家或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时,其外交亲美立场能够显著减少中国 OFDI。本文结论证明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加强管控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针对性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供着力点。

【关键词】 中美博弈 第三方国家外交立场 对外直接投资

【作者简介】 韩永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邮箱:hanyonghui2006@foxmail.com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产业政策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实证识别与中国方案”(72073037)、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面向全球价值链的产业政策治理研究”(2022B1515020008)、广东省社科联青年学术工作坊“工业智能化影响产业链安全及海外利益保护的理论机制、作用效果与政策建议”(2025GZF10)和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德育专项(2023JKDY01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在论文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国际政治科学》2025 年第 10 卷第 4 期(总第 40 期),第 184—218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张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讲师。

邮箱:franc.cheung@foxmail.com

王贤彬,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邮箱:wangxianbin123@163.com

引言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除了继续巩固贸易高质量发展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还需要提升对外直接投资(OFDI)能效。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是中国扩大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发展阶段下推动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

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面临内外部多重挑战。一方面,国内企业“走出去”能力和经验仍偏不足,非理性投资决策频发,抗风险冲击的韧性不强。^①另一方面,后疫情时期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仍然较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遭受的国际政治干预越发频繁。^②在这些政治干预中,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通常扮演着台前或幕后的主导者角色。美国不仅禁止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中国企业继续在美国本土开展业务,还以盟友为基础加强构筑“反华阵线”,鼓吹中国企业带来的安全风险,联合国长期干预华为、中兴和海康威视等中国企业正常的国际商业活动。目前美国已经将70余家中国大陆企业列入“中国涉军企业名单”,对其海外投资进行严苛限制。美国还在美国证券交易系统中针对中国企业进行诸多审查,如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中国企业的监管,要求其必须披露是否由政府实体拥有或控制,并提供审计检查证据。

中美是当今国际秩序中最重要两支政治经济力量,中美之间的“大国

^① 韩永辉、王贤彬、韦东明:《民间外交的经济价值——来自友好城市缔结与企业对外并购的微观证据》,载《经济科学》,2023年第6期,第86—105页。

^② 张建清等:《东道国外资审查制度与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载《世界经济研究》,2024年第2期,第49—62+136页。

角力”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秩序形态。^① 在中美博弈持续升温、双边关系愈发复杂且前景不甚明朗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影响力不及中美的其他一般国家不得不在中美博弈中辗转腾挪,不断调整外交立场以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外交立场定位,对于其是否选择加强对华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澳大利亚在近年选择“亲美反华”,因而在经济领域也大幅减少对华合作。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已经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2020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仅有8亿美元,同比下降近三分之二。^② 又如,拜登政府上任后,英国多次配合美方对中国实施制裁,包括与美国步调一致打击我国高科技企业、操弄人权问题抵制“新疆棉”等,使得中英经贸关系不确定性大幅提高。2020年中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约为9.2亿美元,与2019相比下降了16.6%,为近十年来最低水平。^③

在中美博弈的背景和视角下,研究第三方国家外交立场在中美间的亲疏变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难度。在理论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献研究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④但这些研究只关注到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双向互动,忽视了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地,这种对大国尤其是美国政治影响力的忽视会在理论上产生一个逻辑问题,即东道国对华政治关系趋于密切的同时,可能也在向美国的政治立场靠拢。亦即,东道国对华亲近的外交立场可能是在美国政治干预下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东道国政治

① 赵明昊:《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第26—48+5—6页;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28—57+155—156页。

②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详见 <https://images.mofcom.gov.cn/fec/202211/20221107152537194>。

③ 数据来源:同上。

④ 例如,张建红、姜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133—155页;杨连星、刘晓光、张杰:《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1期,第56—72页;戴利研、李震:《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1期,第94—109页;王金波:《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5~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3期,第4—28页。

关系的改善实际上是源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往文献对该问题的忽视削弱了其研究结论的有效性。此外,虽然也有文献关注到美国对中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影响,^①但这部分文献大多缺乏严谨的量化分析,因此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仍有进一步增强的空间。在国际政治现实中,不乏政治上“反华亲美”但经济上对华经贸合作密切的国家,如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有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同时亲美和亲华的国家,如巴基斯坦;也有坚持在中美之间维持立场平衡的国家,如新加坡,所以并不能简单地从现实案例中找到答案。

在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相对优势呈现一定程度的削弱。^②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一系列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更是导致其国际社会领导角色备受质疑。但是仍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衰落只是相对衰落,美国依然是在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领域均全面超越其他国家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世界各国的外交立场选择仍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并以此在对华博弈中干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由此,在中美角力背景下准确识别第三方国家外交立场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对于推进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和更好制订对美外交策略都至关重要。

本文提出,东道国在中美博弈下的外交立场抉择,决定了它对中国开展投资合作的态度。若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对华更亲近,则会对中国的 OFDI 持更加开放欢迎的态度;反之,则持保守乃至对抗的态度。完成政策倾向的定位后,第三方国家会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来自中国的 OFDI 进行调节。进一步地,第三方国家很可能会通过“对华疏离、对美亲近”的外交立场迫使中国对其投入更多的 OFDI。本文基于中美“大国角力”的视角,采用 2005—2020 年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识别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两国间关系的动态抉择,量化第三方国家外交立场在中美之间的亲疏变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而验证了前述提出的观点。

① 例如,崔连标等:《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影响评估》,载《财经研究》,2018 年第 12 期,第 4—17 页;万源星、魏紫萱、王怡舒:《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吗?》,载《科学学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1—13 页。

② 刘丰:《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第 23—44 页;韩永辉、张帆、李子文:《中美经贸关系演进的现状、动因与对策》,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24—39 页。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从中美大国博弈视角切入,基于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外交立场亲疏选择,研究国际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弥补了过往研究只关注东道国与中国政治关系变化而忽视了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不足。二是,创新性地使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识别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外交立场动态变化,并通过量化分析方法识别了第三方国家外交立场在中美间亲疏变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弥补了过往研究单纯应用重大政治事件进行案例分析的不足。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研究并构建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为实证建模和实证结果的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和讨论。

一、文献回顾和理论机制

(一) 文献回顾

大量学者在政治学、制度学 and 经济学等领域探讨了国际关系或政治关系对 OFDI 的影响,观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密切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可有效促进母国 OFDI 的发展,而另一类观点认为双边政治关系对 OFDI 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还取决于诸多其他因素。此外,也有部分文献对美国因素在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 双边政治关系和对外直接投资

以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核心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促进母国 OFDI 发展。^① 理性制度主义理论提出,国家之间的制度安排既可通过规范性结构的塑造约束双边自利行为,又可通过提供重复博弈平台和减弱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方式缓解政治市场失灵,还可加速双边投资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的创造与完善,从而降低合法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从多个层面促进政府间互利协议的达成及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②

^①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49, No. 1, 1993, pp. 11-23; 马骏:《国际制度的“次优”选择——从“有限理性”到“不确定性”》,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28—142页;田野:《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5—24+155页。

^②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is still Possibl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0, No. 4, 2015, pp. 92-94.

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可通过不同的机制对 OFDI 产生显著的影响。双边政治关系的具体机制中,既包含以长久外交关系为主的正式制度安排,又包含友好城市和文化交流等补充性的机制安排。双边正式、友好而长久的外交关系作为一种中长期的正式制度安排,既有利于完善规则、保障投资者利益,又能深化制度嵌入,给予投资者足够的时间根据东道国制度自我调整、修正和适应,或在东道国复制母国投资环境和制度系统,进而增强母国企业获得比较优势和开展 OFDI 的信心。^① 非正式的双边制度安排中,友好城市可通过地方委员会督促、给予“优先待遇”、合理分配及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从而赋予企业所有权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和履约风险、关注企业个性化投资需求等途径直接推动母国在合作城市的 OFDI;^② 高层互访作为一种特殊的短期双边政治性外交活动,可以降低跨国企业谈判交易费用并提高企业产权保护、剩余索取和内部收益外部化的能力,从而引发 OFDI 的集约和拓展边际增长;^③ 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和保障投资争端解决,为企业进行 OFDI 提供标准化的规则与仲裁方案,优化母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环境。^④

部分研究在中国语境下验证了上述观点的适用性并进行了细化拓展。以事件数据分析法为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基本方法,建交时间、高层互访、

^① Carolyn Erdener and Daniel M. Shapir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amily Enterprises and Dunning’s Eclectic MNE Paradigm,”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 1, No. 3, 2005, pp. 411-436.

^② Earl H. Fry,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09, No. 1, 1990, pp. 118-127; Hilda Blanco and Tim Campbell, “Social Capital of Cities: Emerging Networks of Horizontal Assistance,” *Technology in Society*, Vol. 28, No. 1-2, 2006, pp. 169-181; Rodolphe Desbordes, “Global and Diplomatic Political Risk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22, No. 1, 2010, pp. 92-125.

^③ Stephen J. Kobrin et al.,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Noneconomic Environments by American firms: A Preliminary Repor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1, No. 1, 1980, pp. 32-47; Bala Ramasamy and Rolf D. Cremer, “Cities, Commerce and Culture: The Economic role of International Sister-C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Asia,”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3, No. 3, 1998, pp. 446-461.

^④ Beth A. Simmons, “Bargaining over BITs, Arbitrating Awards: The Regime for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World Politics*, Vol. 66, No. 1, 2014, pp. 12-46.

双边冲突、双边投资协定、友好城市等事件变量被广泛运用于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张建红和姜建刚对2003—2010年中国对131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进行面板校正误差回归,发现双边政治性制度安排(外交关系和友好城市)的建立能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双边友好外交活动能维护敏感重要投资。^① 张雅萌(Yameng Zhang)等对中国省级政府与102个国家发展的967例国际友好城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双边友好城市的建立的是中国省级政府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在当地领导处于任职后期且将继任时,友好城市对OFDI的促进效应更强。^② 郭焯和许陈生用面板校正误差模型研究发现,2003—2013年间,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层的双边会晤显著积极地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两者的积极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在会晤模式上,出访促进作用大于接访,工作会晤无显著作用。^③ 杨连星等基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层面OFDI数据分析发现,友好双边政治关系对扩大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增加成功率和提升多元化程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政策工具和行业差异。高层互访和友好城市交流对于企业投资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促进效应更强,友好城市能显著提升对外投资成功率。^④

总体而言,已有文献在识别政治关系的时候大多只关注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却忽略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对于部分东道国对华政策的干预,这导致相关研究只识别到表面的因素而遗漏了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美国霸权主义政策对东道国外交选择的驱动作用。

2. 对两者关系的约束因素

在全球化时代下,双边政治关系是否对直接投资存在影响还取决于诸

① 张建红、姜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133—155页。

② Yameng Zhang et al.,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Cities, Regional Government Leaders,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 108, 2020, pp. 105-118.

③ 郭焯、许陈生:《双边高层会晤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载《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2期,第26—36页。

④ 杨连星、刘晓光、张杰:《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1期,第56—72页。

多其他因素,其中既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也涵盖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决策等微观因素。李泉(Quan Li)和塔季扬娜·瓦希尔科(Tatiana Vashchilko)针对1980—2000年1117个跨国公司和58个国家的跨国投资行为开展研究,发现军事冲突的发生和安全联盟的建立是否影响企业和国家的投资决策受到该国实际人均国民收入的调节。^① 克里斯蒂娜·L.戴维斯(Christina L. Davis)和索菲·穆尼耶(Sophie Meunier)对美法和中日十二年间的政治冲突的和经济反应进行研究发现,经济主体缺乏将政治关系和经济联系进行捆绑的激励,已有投资带来的沉淀成本导致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面对政治争端时拒绝改变相关经济行为,即国际关系的恶化不会导致跨国公司改变其投资决定。^② 与此同时,有较多国内学者探究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以东道国制度环境为代表的其他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数探究集中在双边政治关系是否能及如何调节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本认为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不确定性,缓解东道国低质量制度对中国OFDI的抑制效应,以及提升OFDI规模和成效。^③ 也有研究发现企业的国际化经验和企业所有制能够调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所面临的政治风险。^④

① Quan Li and Tatiana Vashchilko, "Dyadic military conflict, security alliances, and bilateral FDI flow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41, No. 5, 2010, pp. 765-782.

② Christina L. Davis and Sophie Meunier, "Business as Usual? Economic Responses to Political Tens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5, No. 3, 2011, pp. 628-646.

③ 潘镇、金中坤:《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载《财贸经济》,2015年第6期,第85—97页;刘晓光、杨连星:《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载《金融研究》,2016年第12期,第17—31页;王金波:《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5~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3期,第4—28页;张倩、李芳芳、程宝栋:《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载《国际经贸探索》,2019年第6期,第89—103页。

④ 衣长军等:《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所有制与国际化经验的调节视角》,载《国际贸易问题》,2019年第9期,第115—132页。

与正向调节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立场相对,也有学者认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不同方面产生的调节效应不尽相同。例如,双边投资协定、伙伴关系两者分别与制度质量之间存在优化互补和相互替代关系,政治冲突则会显著抑制对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的投资,提高非正式制度距离的门槛效应。由此可见,现有的关于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直接投资仍未达成研究共识,在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趋频繁和国际形势更加复杂的情况下,更加值得作出针对性的实证考察。另外,少量研究关注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调节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 OFDI 的影响。戴利研和李震以中国对 89 个国家 2003—2015 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①并参考艾普尔尔·尼尔(April Knill)以及迈克尔·A. 贝利(Michael A. Bailey)等学者的研究,^②研究发现,密切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而当东道国具备较高的制度质量时,这种政治关系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会相应减弱,在制度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中这一效应尤为明显。

3. 美国干预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美国作为强大的域外势力,在构建同盟体系时对第三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干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面临的重要不确定性因素。近年来中美关系处于较为紧张的状态,第三方国家的战略价值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更为凸显,美国对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关系升温越发警惕。^③ 万源星指出,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研发投资活动遭受显著冲击,美国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甚至以强权主义联合印度、韩国、墨西哥等第三方国家,通过签

^① 戴利研、李震:《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1期,第94—109页。

^② April Knill, Bong-Soo Lee and Nathan Mauck,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Sovereign Wealth Fund Investment,”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Vol. 18, No. 1, 2012, pp. 108-123;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③ 蔡翠红、李娟:《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网络安全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6期,第51—77页;Timothy R. Heath and William R. Thompson, “Avoiding US-China Competition is Futile: Why the Best Option is to Manage Strategic Rivalry,” *Asia Policy*, Vol. 13, No. 2, 2018, pp. 91-120.

订贸易协定等方式试图在更广阔的地域上阻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①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不仅在多个场合批评“一带一路”倡议,还施压以色列、津巴布韦、巴基斯坦、巴拿马等国家警惕使用来自中国的投资。^②美国的贸易投资限制政策不仅会抑制中美合作,还会干预、扭曲中国与伙伴国家的产业分工格局。^③为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美国凭借其霸权地位,利用对外援助、同盟体系和地缘政治军事等各种域外竞争政策工具强制或诱导其余国家减少与中国的投资合作,从而强化对“对手”中国的压制和规制。^④孙泽生等以三个指标衡量美国域外竞争,包括美国的对外援助、盟国体系以及东道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一致性,利用中国和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3—2018年数据发现,美国的域外竞争政策工具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同时产生阻碍和激励的复合效果。^⑤

总结当前的研究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存在以下四方面的不足。一是,大部分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只关注中国和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忽视了中美“大国角力”的时代背景,未能在研究中认识到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并具有全球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事实,导致相关研究出现忽视重要背景的问题。二是,当前研究美国在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中扮演何种角色的文献大多运用案例分析等定性方法。虽有少数文献使用了量化分析工具,但其对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亲疏抉择仍缺乏合理、客观的识别策略。三是,囿于分析工具的不足和识别策略的不完备,现有研究尚未对中美大国博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有效的异质性分析,难以为中国在不同区域和国家制订具有针对性

① 万源星、魏紫萱、王怡舒:《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吗?》,载《科学学研究》,2022年第5期,第1—13页。

② 赵明昊:《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态势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4—31页。

③ 崔连标等:《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影响评估》,载《财经研究》,2018年第12期,第4—17页。

④ Zack Cooper and Andrew Shearer, “Thinking Clearly about China’s Layered Indo-Pacific Strateg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73, No. 5, 2017, pp. 305-311.

⑤ 孙泽生、严亚萍、赵红军:《域外竞争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吗?》,载《亚太经济》,2021年第1期,第82—89页。

的国际关系策略提供理论支持。四是,虽有大量文献强调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但大多数研究未能以定量研究的方式提供有力的论据支撑,单纯依靠案例分析和语言推演方法得出研究结论,反而可能会导致美国因素的重要性受到质疑。

(二) 理论机制

本文认为,中美两国的政治影响力对第三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显著的“拉力”,这种拉力体现在第三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决议投票时的立场选择上,即在“亲中疏美”或“亲美疏中”之间动态徘徊。第三方国家的这一立场不仅反映了其外交战略的权衡,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政策态度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对华更加亲近时,倾向于采取更加开放和友好的态度,降低中国 OFDI 的落地成本,从而促进中国对其开展直接投资活动(假设 1)。但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部分第三方国家可能采取更为复杂的策略性行为。这些国家通过“对华疏离、对美亲近”的外交立场,试图利用中美竞争迫使中国对其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从而最大化国家利益(假设 2)。这种策略属于国际关系中的“对冲策略”或“平衡策略”,即通过在大国之间保持灵活的外交立场,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或政治让步。

这种对冲策略的机制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阐释。首先,第三方国家的外交立场会对中国 OFDI 的风险感知和成本结构产生直接影响。对华亲近的立场可通过政策优惠、投资保护和制度便利等形式,降低中国企业的政治风险和交易成本,而对华疏离的立场则可能增加不确定性,甚至通过政策性限制提高中国企业的投资门槛。其次,部分第三方国家可能通过阶段性“选边站队”的方式,利用中国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和中美博弈竞争的加剧,迫使中国在外交或经济领域做出更多让步。最后,这种策略并非小国专属,区域性强国(如印度)也通过平衡性的多元对冲策略,在中美之间保持灵活性,从而扩大自身的战略空间。

现有研究表明,第三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进行决议投票时时常面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还是“左右逢源”的难题。^① 这在现实中亦能找到

^① 朱立群:《联合国投票变化与国家间关系(1990—2004)》,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49—54页;查雯、李响:《领导集团更迭与外交政策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第53—72页。

大量案例,例如新加坡在东南亚的政治格局中长期扮演中美关系的平衡者角色,既通过与中国的文化亲近和经济联系来稳固自身在东盟中的政治地位,又通过强化对美关系来防止中国“过度介入”东南亚事务^①。在一段时期内,第三方国家可能会通过策略性手段更加靠近中美两国其中一方,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由此推理,如果第三方国家在联大投票中与中国立场趋近,那么该国与美国投票理想点的距离将会扩大;反之,如果第三方国家在联大投票中与美国立场更加趋近,那么该国与中国的联合国大会投票理想点距离将会增加。^② 本文认为,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会同时对第三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产生“拉力”,进而对第三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政治光谱中的定位产生影响。在中美持续博弈的背景下,第三方国家的联合国大会投票理想点会在“亲中疏美”或“亲美疏中”之间动态徘徊(图 1)。在某个阶段内形成策略性的外交立场后,第三方国家便会以此调整对中国的 OFDI 的政治态度,并通过一系列的正式或非正式机制予以安排和产生效应。对华亲近则必然对中国 OFDI 提供便利,对华疏离则必然增加中国 OFDI 落地成本。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对华更亲近,会有利于中国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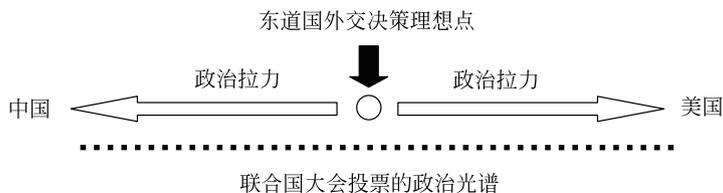


图 1 第三方国家外交立场在中美两国之间偏好选择产生的机理

进一步地,观察国际政治现实可以发现,第三方国家很可能会通过“对

^① Peng Er Lam, “Singapore-China Relations in Geopolitics, Economics, Domestic Politics and Public Opinion: An Awkward “Special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 10, No. 2, 2021, pp. 203-217.

^② 庞珣、王帅:《中美对外援助的国际政治意义——以联合国大会投票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81—203页;漆海霞:《选边站还是左右逢源?——论中国伙伴国在联合国的立场》,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4—33页。

华疏离、对美亲近”的外交立场迫使中国对其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从而获取最大化的国家利益。这种策略在国际关系中被称为“对冲策略”或“平衡策略”。^① 东南亚国家长期以来都是通过在中美之间保持“间接平衡”或“软平衡”来最大化自身利益,当某一方的策略选择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时候,就会通过策略性、阶段性地“倒向”另一方来为自己增加博弈天平上的砝码。不仅是小国,区域性强国也会作出类似的选择。有研究指出,印度在中美之间采取的是平衡性的多元对冲策略,既不完全依赖美国,也不完全疏远中国,并在中美之间根据情况选边站队来增加自身的战略空间。^② 这些研究都表明,在中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第三方国家通过灵活的外交策略来最大化自身利益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也能得到大量的历史事实支持。例如,部分“对台建交”的国家,如巴拉圭、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等,就长期利用台湾问题做文章,不仅一方面要挟“台湾当局”持续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换取美国的政治支持,也长期试图以此“经济勒索”中国。^③ 这些国家实际上是通过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周旋,来最大化自身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方面,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都多次在对华重大谈判沟通之前,通过军舰过台海或进入南海的方式为其增加筹码。^④ 中国周边的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也多次通过向美示好,包括开展联合军演、采购美国军备甚至提供军事基地等方式,

① Cheng-Chwee Kuik,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0, 2016, pp. 500-514.

② Mohan Malik, “Balancing Act: The China-India-U. S. Triangle,” *World Affairs*, Vol. 179, No. 1, 2016, pp. 46-57.

③ Timothy Rich, “Status for Sale: Taiwan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Diplomatic Recognition,” *Issues & Studies*, Vol. 45, 2009, pp. 159-188.

④ 例如,202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在前往日本的途中穿越南海,这一行动被视为对中国的施压,同时也是为英国在与中国的政治角力中增加筹码,资料来源:英国国防部,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carrier-strike-group-to-exercise-with-indo-pacific-partners>, 访问时间:2025年8月14日。另外,2024年五月,德国向印太地区派遣了两艘军舰并可能于八月底穿越台湾海峡,目前德国正就中国对欧盟出口新能源汽车事宜与中国展开激烈谈判。资料来源: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german-warships-await-orders-crossing-disputed-taiwan-strait-2024-08-19/>, 访问时间:2025年8月14日。

来试图逼迫中国在双边争议问题上进行妥协和让步^①。例如,2023年,菲律宾与美国签署了扩大军事基地使用权的协议,这被视为菲律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策略,同时也是为了在与中国的博弈中获得更多筹码^②。总的来说,这种策略反映了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凸显了小国在大国竞争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努力。据此,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部分第三方国家会通过“对华疏离、对美亲近”的外交立场迫使中国对其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

二、实证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 模型设定

引力模型在国际经贸领域首先被运用于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③随后由 S. 拉埃尔·布雷纳德(S. Lael Brainard)引入对外投资领域的分析后得到了广泛使用。^④ 本文根据研究内容需要,参考彼得·J. 巴克利(Peter J. Buckley)等、张彦宏(Yin-Wong Cheung)和钱兴望(Xingwang Qian)的对外直接投资引力模型,^⑤构建中美大国角力下第三方国家外交立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面板数据引力模型基准形式,设定具体模型如下:

^① Carlyle A. Thayer, “Vietnam’s Foreign Policy in an Era of Rising Sino-US Competition and Increasing Domestic Political Influence,” *Asian Security*, Vol. 13, No. 3, 2017, pp. 183-199.

^② 资料来源:Reuters, “Philippines Reveals Locations of 4 New Strategic Sites for U. S. Military Pact,”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philippines-reveals-locations-4-new-strategic-sites-us-military-pact-2023-04-03/>, 访问时间:2025年8月2日。

^③ James E. Anderson,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9, No. 1, 1979, pp. 106-116.

^④ S. Lael Brainard,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Proximity-Concentration Tradeoff between Multinational Sales and Trad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ecember 1993, <https://www.nber.org/papers/w4580>, 访问时间:2025年8月14日。

^⑤ Peter J. Buckley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574-600; Yin-Wong Cheung and Xingwang Qian, “Empiric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 14, No. 3, 2009, pp. 312-341.

$$\text{OFDI}_{ijt} = \beta_0 + \beta_1 \text{Stance}_{ijt} + \sum \beta_m X + \alpha_j + \gamm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其中, i 代表中国, j 代表第三方国家, t 代表年份时间。OFDI_{ijt} 是因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Stance_{ijt} 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代表中美大国角力下的第三方国家外交立场, 其含义为 t 年东道国 j 在中美之间的外交立场是更加亲华还是更加亲美。回归系数 β_1 度量第三方国家外交立场对中国 OFDI 的直接影响效应。X 是控制变量合集, 包括第三方国家在年份 t 的对华政治关系距离(Sino_{jt})、制度环境质量(Ins_{jt})、经济规模(GDP_{jt})、市场增长潜力(GDPR_{jt})、人口规模(Pop_{jt})、自然资源禀赋(Rent_{jt})、通货膨胀率(Infla_{jt})、经济开放度(Open_{jt})。β₀ 为截距项, β_m 是控制变量合集 X 的回归系数, α_j 和 γ_t 分别是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ε_{ijt} 为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OFDI)为中国对第三方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流量, 使用2005—2020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流量统计数据。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有部分数值为零的情况, 为缓解估计偏差, 参考马蒂亚斯·布瑟(Matthias Busse)和卡斯滕·赫费克(Carsten Hefeker)、程盈盈等学者的方法,^①将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进行如下处理: $\text{OFDI} = \ln(x + \sqrt{1+x^2})$, 其中 x 为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

2. 解释变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 有部分文献使用外交伙伴关系等级、大国关系指标等作为衡量中外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② 但以上提及的度量方式往往使

^① Matthias Busse and Carsten Hefeker, "Political Risk,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3, No. 2, 2007, pp. 397-415; 程盈盈、成东申、逯建:《国际舆论对中国引进外资的影响:基于GDELT新闻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研究》,2021年第7期,第19—33页。

^② 邝艳湘、向洪金:《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与转移效应——基于中日关系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139—155页;邓富华、霍伟东、张永山:《双边政治关系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1期,第154—163页。

用单向测量,降低了测量结果的效度,^①认知偏差和信息缺失会造成各国对于政治关系认知的差异,并导致战略误判。本文参考迈克尔·A.贝利(Michael A. Bailey)等学者的做法,^②通过贝叶斯估计方法对项目反应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得出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的理想点数据集,用于度量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外交立场偏向(Stance)。与以往对联合国投票数据的处理相比(例如 S-score),该数据集能有效避免联合国大会的议程变化等噪音干扰,所反映出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同时具有纵向时间可比性和横向国家可比性。该方法下,一国的理想点位置和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均反映了其利益偏好,亦即能够反映国家间关系变化是由哪一国的偏好变化导致的。如果两国之间的理想点绝对差异小,则表明该两国在同一年有相似的外交政策偏好,政治共识趋于一致,可认为政治关系更为亲密;反之,如果两国之间理想点绝对差异大,则表明该两国在同一年的政治关系相对疏远。图2展示了2005—2020年各国在联合国投票大会中的投票理想点数据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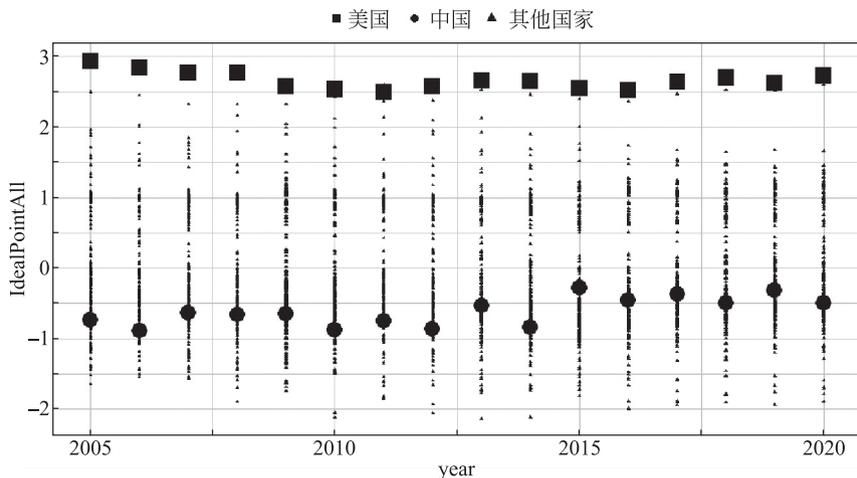


图2 2005—2020年联合国大会投票理想点数据变化轨迹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与事件分析方法——评《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35—137页。

②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2017, pp. 430-456.

本文基于贝利以及戴利研和李震等学者们的做法,使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构建反映“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外交立场偏好变化”的变量 *Stance*,计算方法为第三方国家和中国的投票理想点距离(取绝对值)减去第三方国家和美国的投票理想点距离(取绝对值)。该数值越小,则意味相较于美国而言,第三方国家跟中国更加亲密;数值越大,则意味着第三方国家更加亲美而疏离中国。当“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外交立场偏好变化”变量 *Stance* 的数值在零值附近徘徊时,意味着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实行“骑墙”的平衡术;当该数值长期稳定于某个远离零的值时,说明第三方国家可能在中美之间实行“一边倒”的“大国跟随”政策。进一步地,观察图 2 可知,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中的理想点轨迹长期保持较大的距离——美国长期稳定游离于主流国际社会的投票偏好点之外,而中国的投票理想点则长期与广大国际社会保持一致,因中美投票理想点一致而产生的第三方国家在中美间外交立场偏好数值 *Stance* 为零(或接近零)的可能性是较低的。

进一步地,本文在实证中还将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关系(*Sino*)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回归,用以比对考察其与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外交立场(*Stance*)对中国 OFDI 的影响效应的差异。本文使用第三方国家在 t 年与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的理想点距离作为代理变量。本文提出的解释变量 *Stance*,旨在拓展现有文献中以 *Sino*(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研究框架。尽管 *Sino* 能够反映中国与第三方国家直接的政治关系,但它忽略了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对第三方国家外交政策的间接干预。中美博弈背景下,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外交立场选择往往受到复杂的外部力量驱动,单纯依赖 *Sino* 无法充分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东道国即使与中国政治关系相对紧密,但其对美外交立场的调整仍可能显著影响中国对该国投资的决策。此外,*Sino* 是针对中国与东道国双边政治关系的直接测量,侧重反映中国与第三方国家之间的单向互动关系,能够很好地捕捉双边政治关系的亲疏变化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Stance* 则是在中美博弈的框架下,通过第三方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外交立场对比,揭示该国在中美间外交选边站队的动态变化。*Stance* 的目的在于考虑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对第三方国家外交立场的间接干预,这种影响无法通过 *Sino* 单一变量反映。因此,*Stance* 作为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外交立场动态变化的量化指标,能

够捕捉中美博弈对中国 OFDI 的间接效应,弥补 Sino 在这一领域的不足。

从理论上讲,Stance 和 Sino 的引入分别旨在捕捉两种不同层次的政治影响力:一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政治关系(Sino),二是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第三方国家的外交立场选择及其对中国 OFDI 的间接影响(Stance)。因此,将它们同时纳入同一模型可能会引发多重共线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失真或模型不收敛。此外,Stance 和 Sino 分别是不同理论假设的核心变量,其独立纳入模型分析能够更清晰地验证各自的理论逻辑。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中普遍涉及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本文共选取七个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地控制东道国本土市场因素对吸引中国 OFDI 的影响。

制度质量是第三方国家投资环境的重要衡量指标,制度风险的存在会对母国企业资产存在各种形式的损失威胁,^①是影响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关键要素。世界银行发布《全球治理指标》对各国制度质量进行评估,包含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腐败控制、法律制度和话语问责权六个方面的指标。大量学者采用上述指标就东道国制度质量对 OFDI 的影响展开了研究。^② 本文参照黄新飞等学者的识别策略,^③对六个指标加总后取平均值,用以识别第三方国家的制度环境质量。

市场导向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特征,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大量学

^① Iris Kesternich and Monika Schnitzer, "Who is Afraid of Political Risk?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ir Choice of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82, No. 2, 2010, pp. 208-218.

^② 例如,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载《管理世界》,2012年第11期,第45—56页;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第126—142页;池建宇、方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载《国际经贸探索》,2014年第1期,第81—91页;陈升、张俊龙:《东道国制度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综合运用全球治理指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载《产经评论》,2019年第3期,第56—66页。

^③ 黄新飞、舒元、徐裕敏:《制度距离与跨国收入差距》,载《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第4—16页。

者将投资的市场动机看作中国 OFDI 的核心驱动。^① 约翰·H. 邓宁(John H. Dunning)将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划分为市场导向、资源导向、战略资产导向和效率导向四种,^②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的市场、自然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寻求导向。^③ 因此,本文参考部分学者的做法,^④引入第三方国家的 GDP 和 GDP 增速分别度量其市场规模(GDPM)和市场增长潜力(GDPR),用以反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动机;选择第三方国家自然资源租金衡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Rent)以反映自然资源获取动机;选取第三方国家总劳动人口数作为东道国人口规模(Pop)的代理变量以反映劳动力寻求动机。以上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采用2010年不变价计算。

此外,本文还参考郭娟娟和杨俊(2019)的研究对第三方国家的经济开放度(Open)和通货膨胀率(Infla)进行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会影响到企业投资过程中需要支付的资金规模,因此应该对通货膨胀率这一指标加以控制。经济开放度反映了第三方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

① 如,Ping Deng, "Foreign Investment by Multinationals from Emerg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China,"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2003, pp. 113-124; Bala Ramasamy, Matthew Yeung and Sylvie Laforet,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47, No. 1, 2012, pp. 17-25.

② John H. Dunning, "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Neglected Fa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29, No. 1, 1998, pp. 45-66.

③ 如, Kevin G. Cai,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Novel Dimension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60, 1999, pp. 856-880; Ping Deng, "Outward Investment by Chinese MNCs: 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 *Business Horizons*, Vol. 47, No. 3, 2004, pp. 8-16; Yin-Wong Cheung and Xingwang Qian, "Empiric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 14, No. 3, 2009, pp. 312-341; 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载《世界经济》,2012年第9期,第21—40页。

④ 如,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载《管理世界》,2012年第11期,第45—56页;胡兵、邓富华:《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载《财贸经济》,2014年第4期,第82—92页;陈琳、袁志刚、朱一帆:《人民币汇率波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载《金融研究》,2020年第3期,第21—38页。

的深度,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对于外来投资更可能持欢迎态度,本文使用第三方国家当年国际贸易规模占 GDP 比重来识别经济开放度。以上两个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表 1 为描述性统计。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对外直接投资	OFDI	2224	24.612	16.798	0.000	57.990
第三方国家在 中美间外交立场	Stance	2224	-2.050	1.477	-3.705	3.705
中国与第三方 国家政治距离	Sino	2224	0.733	0.685	0.000	3.705
制度环境	Ins	2224	-0.043	0.911	-2.000	1.894
GDPM	GDP	2224	24.721	2.120	18.731	30.696
GDP 增长率	GDPR	2224	1.790	5.520	-62.378	121.780
人口总量	Pop	2224	16.131	1.735	11.308	21.045
通货膨胀	Infla	2224	4.985	6.646	-10.067	150.323
自然资源禀赋	Rent	2224	8.568	13.032	0.000	81.950
对外开放度	Open	2224	66.506	36.851	16.3603	343.481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

表 2 展现了基准回归的计量结果。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的解释变量为“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大国角力中的外交立场”(Stance),即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博弈之间的关系选择倾向。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单独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单独控制时间固定效应还是对个体和时间效应均进行控制,Stance 的系数均在 5%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说明第三方国家越亲华而疏离美国,则越有利于扩大中国对第三方国家的 OFDI;第三方国家亲美而疏离中国,则对中国 OFDI 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的解释变量为中国与第三方国家的政治距离(Sino),可见无论是单独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单独控制时间固定效应还是对个体和时间效应均进行控制,中国与第三方国家的政治距

表2 基准回归

	(1)	(2)	(3)	(4)	(5)	(6)
	东道国在中美大国角力中的外交立场			中国与东道国政治距离		
Stance	-1.1831** (0.597)	-1.2692** (0.612)	-1.2711** (0.610)			
Sino				-2.2936* (1.194)	-2.2009* (1.233)	-2.2088* (1.226)
Ins	2.2767* (1.201)	3.2006** (1.272)	3.1555** (1.271)	2.0318* (1.186)	2.8290** (1.246)	2.7825** (1.246)
GDPM	1.2023** (0.569)	0.7215 (0.598)	0.7575 (0.612)	1.2516** (0.574)	0.7606 (0.615)	0.7989 (0.628)
GDPR	0.1125 (0.092)	0.1039 (0.104)	0.1036 (0.104)	0.1117 (0.092)	0.0996 (0.102)	0.0993 (0.102)
Pop	2.9128*** (0.739)	3.4161*** (0.746)	3.3654*** (0.772)	2.8838*** (0.739)	3.3800*** (0.746)	3.3268*** (0.771)
Infla	-0.1146** (0.051)	-0.0642 (0.049)	-0.0654 (0.050)	-0.1038** (0.050)	-0.0539 (0.048)	-0.0551 (0.049)
Rent	0.0853 (0.052)	0.1030* (0.054)	0.1009* (0.055)	0.0915* (0.051)	0.1101** (0.054)	0.1078* (0.055)
Open	0.0263 (0.020)	0.0282 (0.020)	0.0276 (0.020)	0.0274 (0.020)	0.0295 (0.021)	0.0289 (0.020)
Cons	-57.0188*** (8.434)	-59.0796*** (8.573)	-59.4374*** (8.583)	-53.8652*** (7.845)	-55.1382*** (8.049)	-55.5123*** (8.031)
Country FE	Yes	No	Yes	Yes	No	Yes
Year FE	No	Yes	Yes	No	Yes	Yes
N	2224	2224	2224	2224	2224	2224
R ²	0.167	0.213	0.213	0.167	0.212	0.212

注: Robust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离(Sino)均在10%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该实证结果印证了大多数过往研究的结论,即中国与第三方国家的政治距离越大,中国对第三方国家的OFDI

续表

	(7)	(8)	(9)	(10)	(11)	(12)	(13)	(14)
	滞后一期		广义线性回归		增加时间趋势		5%缩尾检验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085	2085	2224	2224	2224	2224	2224	2224
R ²	0.204	0.206	—	—	0.212	0.213	0.220	0.222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模型(7)和模型(8)是考虑滞后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分别采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 Stance 和 Sino,加入了全部的控制变量,并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予以控制。结果显示: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博弈下的外交立场变量(Stance)在 5%的水平上负向显著,中国和第三方国家政治距离(Sino)在 10%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这意味着第三方国家在国际政治关系中越是亲华疏美,则越有利于中国对其扩大 OFDI;第三方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越密切,越有利于中国扩大对第三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模型(9)和模型(10)使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加入了全部的控制变量,并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予以控制。结果显示,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博弈下的外交立场变量(Stance)在 5%的水平上负向显著,中国和东道国政治距离(Sino)在 10%的水平上负向显著,验证了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

模型(11)和模型(12)构建时间趋势变量及其二次项,加入了全部的控制变量,并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予以控制。结果显示,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博弈下的外交立场变量(Stance)在 5%的水平上负向显著,中国和第三方国家政治距离(Sino)在 10%的水平上负向显著。两个模型中的时间趋势项均在 5%的水平上负显著,时间趋势二次项在 5%的水平上正显著。

模型(13)和模型(14)考虑原始样本中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对所有变量前后 5%进行缩尾处理,仍然加入了全部的控制变量,并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予以控制。实证结果显示,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博弈下的外交立场变量(Stance)在 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中国和第三方国家政治距离(Sino)在 5%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内生性检验

本文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有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

第三方国家可能会基于两国之间的投资合作程度而作出政治关系调节的决策,从而导致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尽管本文已经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质量、市场潜力和人口规模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但仍然可能存在因遗漏重要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可靠的工具变量既与中国和第三国家的政治关系有相关性,又必须满足与原模型扰动项不相关的外生性条件。

本文参考闫雪凌和林建浩的做法,^①将第三方国家曾经或现在是否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工具变量。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国际外交政策中,与现在或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持良好的政治关系是较为重要的考量,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与此同时,第三方国家是否曾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影响当前中国企业的 OFDI 决策,因为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中国 OFDI 呈现出强烈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

内生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表 4),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都对解释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可识别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条件。第二阶段回归中,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博弈下的外交立场变量(Stance)系数在 5%水平上负向显著,中国与第三方国家政治距离变量(Sino)系数在 10%水平上负向显著,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非常接近。证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可靠的,且不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

表 4 内生性检验

	(15)	(16)	(17)	(18)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V(Stance)	0.6391*** (0.208)			
IV(Sino)		0.2919*** (0.097)		
Stance			-1.2711** (0.604)	

^① 闫雪凌、林建浩:《领导人访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载《世界经济》,2019年第2期,第147—169页。

续表

	(15)	(16)	(17)	(18)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Sino				-2.2088* (1.215)
Control Var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2224	2224	2224	2224
R ²	0.529	0.475	0.213	0.212
F	44.25	19.96	—	—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4. 异质性分析

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在全球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国家中发挥的效应不尽相同,因而对中国在东道国 OFDI 发展的干预作用也有差异。本文通过地区异质性、“一带一路”异质性和发展水平异质性三个维度来进行更进一步的定量考察,检验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博弈下的外交立场和中国与第三方国家政治距离对中国 OFDI 的异质性影响,从而为中国在不同地区和国家设计不同的外交策略和 OFDI 合作模式提供有针对性的实证依据。

(1) 地区异质性

表 5 展示了地区异质性的实证结果。非洲国家方面,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博弈下的外交立场变量 Stance 的交互项不显著,意味着美国因素可能不是非洲国家吸纳 OFDI 时的重要考量。Sino 的交互项在 10%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在非洲的 OFDI 更倾向于进入自然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庞大的国家,但这些国家跟中国的政治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如尼日利亚);对华关系紧密的国家囿于市场和资源规模制约,难以吸引中国投资。美洲国家方面,Sino 的交互项不显著而 Stance 的交互项在 1% 水平上正向显著,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外,中国对美洲的投资可能主要进入不具备安全敏感性的中低端市场和非技术性领域,因此美国和亲美的第三方国家并不反对此类资金进入;另一方面,在根深蒂固的门罗主义思想下,美洲长期被视为美国的“后花园”,政治上向美国靠拢有利

于美洲国家执政集团的政权稳固。但由于美国所提供的经济回报和发展机遇不足,这些国家仍需要加强对华经贸合作以驱动经济增长,由此出现了“对美政治关系越亲近,对华经济合作越紧密”的现象。

表 5 区域异质性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Stance	-1.2424** (0.601)		-1.3271** (0.575)		0.4284 (0.602)		-1.3745** (0.615)	
Sino		-2.3558* (1.229)		-2.3354** (1.174)		1.3168 (1.094)		-2.6092** (1.260)
Stance * 非洲	-0.2908 (0.497)							
Sino * 非洲		4.0232* (2.357)						
Stance * 美洲			2.5349*** (0.719)					
Sino * 美洲				0.8373 (2.124)				
Stance * 欧洲					1.1485 (0.780)			
Sino * 欧洲						-4.7650*** (1.029)		
Stance * 亚洲							-1.2520** (0.570)	
Sino * 亚洲								5.5270*** (1.354)
Control V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224	2224	2224	2224	2224	2224	2224	2224
R ²	0.214	0.214	0.230	0.212	0.214	0.227	0.220	0.224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欧洲国家方面,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大国角力中的外交立场变量(Stance)不显著,可能意味着大部分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具备较强的抵御能力(表5)。但中国和第三方国家政治距离(Sino)和欧洲国家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说明中国与欧洲国家的政治距离越接近,越有利于中国企业对欧洲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一步地,本文从欧洲国家内部异质性的视角出发,探索中美大国博弈对欧洲吸引中国OFDI的影响(表6)。模型(27)和模型(28)展示了对英法德三个欧洲国家进行回归的结果,实证表明欧洲核心国家的中美间外交立场变量(Stance)和对华政治距离变量(Sino)至少在10%水平上正向显著,即欧洲大国对华疏远、对美亲近的外交立场更有利于吸引来自中国的OFDI。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对欧洲大国的OFDI存在一定的“政治交易”性质,即期望通过经济合作减少其外交立场对华背离和跟随美国的程度;而从欧洲大国的视角来看,也可以将此现象解释为一种“投资勒索”行为,即通过政治上亲美来换取更多的中国投资。从Stance和Sino系数及显著程度的差异也可以发现,若欧洲大国外交立场背离中国而跟随美国,其对华OFDI的“吸引力”虽显著但是偏弱;而若欧洲大国外交立场是在跟随美国、背离中国的话,则能够强而有力地吸引更多中国OFDI。模型(29)和模型(30)对除了英法德三国之外的欧洲国家进行了检验,模型(31)和模型(32)检验了北约东扩新增国家的效应,结果表明均不显著,意味着整体上中国OFDI对于欧洲小国的外交立场影响并不敏感。

表6 欧洲内部异质性

	(27)	(28)	(29)	(30)	(31)	(32)
	英法德		其他欧洲国家(除英法德)		北约东扩	
Stance	28.488*** (1.294)		-0.420 (0.586)		-5.767 (5.875)	
Sino		27.871* (8.838)		-1.568 (1.233)		1.472 (9.275)
Control V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8	48	480	480	112	112
R ²	0.340	0.305	0.201	0.202	0.321	0.316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由于欧洲经济水平较高且科学技术较为发达,中国对欧洲投资具有强烈的技术寻求动机。为排除技术寻求因素对中国对欧洲 OFDI 的干扰性因素,本文对此进行进一步检验。一般认为,人均 GDP 高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其科技水平一般也较高,很多研究也使用人均 GDP 作为地区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① 尤其是在欧洲地区,不仅英法德等老牌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人均 GDP,中等规模国家如瑞典和芬兰,以及小国荷兰和瑞士等,都具有较高的人均 GDP。因此,本文使用人均 GDP(gdppc)作为欧洲地区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干扰因素排除检验,结果展示在表 7。可见,虽然中国和英法德的政治距离(Sino)不显著,但英法德在中美之间的外交立场偏好(Stance)仍然在 1%水平上正向显著,因此英法德三国对中国存在的“经济勒索”现象是稳健的。其他欧洲国家和北约东扩国家的基本结论保持不变。

表 7 欧洲内部异质性:排除技术因素

	(33)	(34)	(35)	(36)	(37)	(38)
	英法德		其他欧洲国家(除英法德)		北约东扩	
Stance	28.461*** (1.462)		0.012 (0.673)		-4.951 (7.430)	
Sino		29.166 (11.463)		-0.807 (1.436)		2.023 (9.692)
gdppc	-0.006 (0.017)	-0.009 (0.01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Control V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8	48	480	480	112	112
R ²	0.345	0.314	0.229	0.229	0.322	0.319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① 杨连星、刘晓光、张杰:《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1期,第56—72页;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载《经济研究》,2017年第8期,第33—48页。

亚洲国家方面,东道国在中美大国角力中外交立场变量 Stance 的交互项在 5%水平上负向显著,意味着美国政治因素在亚洲的确发挥着重要的干预作用(表 5);而 Sino 的交互项在 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意味中国 OFDI 的亚洲主要目的国大多对华存在“政冷经热”的现象(如日本、韩国等)。进一步地,本文基于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异质性的视角,探索中美大国博弈对亚洲国家吸引中国 OFDI 的影响(表 8)。模型(39)和模型(40)对第一岛链国家进行了检验,^①模型(41)和模型(42)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重要盟友(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进行了检验,^②发现中国和东道国政治距离 Sino 均不显著,而东道国在中美间外交立场变量 Stance 则至少在 10%水平上正向显著,即这些重要的地缘政治国家对美外交立场越亲近,越能够吸引来自中国的 OFDI。欧洲大国样本中表现出来的 OFDI“政治交易”和“投资勒索”特性在此处也能充分体现。

表 8 亚洲内部异质性

	(39)	(40)	(41)	(42)
	第一岛链国家		重要盟友	
Stance	7.516*		15.367**	
	(3.668)		(4.149)	
Sino		7.590		13.661
		(4.123)		(6.569)
Control Var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96	96	64	64
R ²	0.258	0.251	0.190	0.142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① 第一岛链国家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

② 文章将大洋洲国家归入了亚洲样本进行处理,由于大洋洲仅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近年也积极介入到亚洲事务当中,因此这种处理方法具有一定合理性。

本文还对第三方国家境内是否有美军基地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美军基地数目及所在国数据来源于美国国防部每年发布的《Base Structure Report》。实证结果显示(表 9),若第三方国家境内有美军基地,那么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博弈下的外交立场变量 Stance 则会在 10%水平上负向显著,若第三方国家境内没有美军基地,则 Stance 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境内有美军基地及美国军事存在的国家会更容易受到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操控,并对来自中国的 OFDI 产生抑制作用。

表 9 境内是否有美军基地

	(43)	(44)	(45)	(46)
	境内有美军基地		境内无美军基地	
Stance	-1.791*		-0.998	
	(1.021)		(0.778)	
Sino		-3.062		-1.944
		(1.954)		(1.488)
Control Var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544	544	1680	1680
R ²	0.238	0.234	0.155	0.155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2) “一带一路”异质性

本文对第三方国家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异质性检验(表 10)。实证结果表明,在“一带一路”国家样本中,东道国在中美博弈下的外交立场变量 Stance 的系数与中国和第三方国家政治距离 Sino 系数均在 1%水平上负向显著,和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而在非“一带一路”国家样本中,两个系数均不显著。以上发现可能意味着,在考虑美国地缘政治因素后,中国越是能够争取“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支持,越能够促进对其 OFDI 发展。由此可见,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持阻挠态度、默许态度还是支持态度,对于中国与各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可能意味着美国正与中国围绕“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激烈的“政治争

夺”,试图从国际政治层面削弱“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基础。

表 10 是否“一带一路”国家

	(47)	(48)	(49)	(50)
	“一带一路”国家		非“一带一路”国家	
Stance	-2.930*** (0.944)		1.431 (0.890)	
Sino		-5.151*** (1.878)		2.021 (1.485)
Control Var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630	630	915	915
R ²	0.164	0.153	0.130	0.128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进一步地,本文根据 The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中的政治风险指数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风险程度归类,然后进行检验(表 11)。实证结果表明,在高政治风险组别中,第三方国家在中美间外交立场变量 Stance 与中国和第三方国家政治距离变量 Sino 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在低政治风险组别中,两者的系数均在 5%水平上负向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争夺”在低政治风险国家中更为明显。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更为稳定,在扰乱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战略部署方面具有更高的“统战价值”,因此推动这些国家在外交立场上疏远中国、亲近美国更能够有效削弱“一带一路”倡议的效力。

表 11 “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高低

	(51)	(52)	(53)	(54)
	高政治风险		低政治风险	
Stance	-1.701 (1.107)		-3.461** (1.401)	

续表				
	(51)	(52)	(53)	(54)
	高政治风险		低政治风险	
Sino		-1.105 (1.861)		-6.830** (3.016)
Control Var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249	249	381	381
R ²	0.185	0.177	0.227	0.221

注: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3) 发展水平异质性

本文根据第三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异质性检验(表 12)。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规则,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三个组别。实证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国家中,第三方国家在中美间外交立场变量 Stance 与中国和第三方国家政治距离变量 Sino 的系数均不显著。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两者系数均在 5%水平上负向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在高收入国家中,只有中国和第三方国家政治距离变量 Sino 的系数在 10%水平上负向显著,第三方国家在中美间外交立场变量 Stance 的系数不显著。该结果可能意味着,美国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干预更多地集中在中等收入国家群体当中。而在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中效应不明显的原因可能是前者缺乏争取的战略价值,后者则具有抵抗美国政治干预的能力。

表 12 东道国收入水平高低

	(55)	(56)	(57)	(58)	(59)	(60)
	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Stance	-0.081 (2.432)		-2.248** (0.929)		-1.549 (0.989)	
Sino		-0.231 (3.754)		-3.800** (1.644)		-3.382* (1.915)
Control V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55)	(56)	(57)	(58)	(59)	(60)
	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70	270	1095	1095	720	720
R ²	0.154	0.154	0.160	0.156	0.243	0.245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本文通过进一步区分东道国是否属于 OECD 国家进行检验后发现(表 13),中国和第三方国家政治距离变量 Sino 的系数和第三方国家在中美间外交立场变量 Stance 的系数在 OECD 国家组别中均不显著,而在非 OECD 国家中则均在 1%水平上负向显著。该结果可能印证了前述的分析结论,即美国的地缘政治干预能力主要体现在非发达国家群体当中,非 OECD 国家是美国通过外交政治努力遏制中国 OFDI 发展的重点关注对象。

表 13 是否 OECD 国家

	(61)		(62)	(63)
	OECD 国家		非 OECD 国家	
Stance	0.749		-1.990***	
	(0.626)		(0.678)	
Sino		0.840		-3.886***
		(1.111)		(1.303)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495	495	1729	1729
R ²	0.248	0.247	0.169	0.168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四、结论与讨论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社会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以来,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社会领导能力都出现了相对的衰落。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仍然是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唯一超级大国。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中国要认识到美国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强大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许多国家在中美大国角力下不断调整对华外交立场以获取更大收益的事实。

本文基于中美“大国角力”的视角,采用2005—2020年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识别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两国间的外交立场动态变化,量化第三方国家外交立场在中美间亲疏变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第三方国家在中美博弈下对华亲近对美疏离,能扩大吸引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反之则抑制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2)通过加入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采用广义线性回归、增加时间趋势变量以及对样本进行5%缩尾处理四种方式进行检验后,发现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3)采用是否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发现基准回归结果不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4)当第三方国家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国家时(英法德、第一岛链国家、亚太重要盟友等),其对华疏离、对美亲近反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OFDI,亦即可能存在东道国对华“经济勒索”的现象;(5)相较于非“一带一路”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的外交亲美立场更能显著抑制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该现象在政治风险较低的、具有“统战价值”的“一带一路”国家中更为突出;(6)当第三方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非OECD国家或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时,其外交亲美立场能够显著减少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基于上述探究和结论,针对如何应对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更好地构建中国和第三方国家双边政治关系、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构建良性竞合的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在经济、气候和疫情防控等领域对美合作,以合作利益撬动分化美国内部政治集团,避免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议题导致的中美全面竞争乃至全面对抗。^①一方面,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确保中美相互依存,继续促进基础技术创新,突破“技术瓶颈”,着力提升中国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优势。另一方面,

^① 李巍:《从接触到竞争: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54—80页。

在全球规则体系中确保中美相互依存,夯实适应国际新规则的国内基础,在加快对接和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的同时,不断推动自身实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引领国际新规则的制定。

第二,加强与东道国政治互信,依托共建“一带一路”机遇打造对外直接投资合作平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与第三方国家平等互利互惠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合作,反对国际政治行为“倒逼”市场经济交易,共同抵御域外大国政治干扰。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的同时,规范中国企业在第三方国家投资行为,降低问题投资被上升为国际事件的政治风险。紧抓多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机遇,瞄准第三方国家实际需求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以高质量投资合作驱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① 拓展和打造将第三方市场纳入到框架内的多边直接投资合作平台,争取和支持美国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投资合作项目当中。将外交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和非发达国家群体当中,并在第三方国家拥有美国军事力量进驻的情况下进行更加审慎的对外投资评估。

第三,推动健全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投资合作和治理机制,打造和完善面向企业需求的海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把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机遇,适时推动重启中欧自贸协定谈判,稳步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前期工作,对标国际一流水准全面提升中国制度型开放水平,提升参与全球投资治理制度性话语权,联合多边力量共建新型国际投资治理机制。定时发布海外投资政治风险咨询,帮助企业了解国际政治关系现状,以及中美大国关系走向,帮助市场投资主体密切关注国际动态,减少因信息不畅而导致的问题投资,增强企业应对非经济因素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和韧性。

^① 韩永辉、韦东明、黄亮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耦合效应研究》,载《国际贸易问题》,2021年第4期,第143—158页。

特朗普 2.0 时代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关系： 短期波动，长期趋稳^{*}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

刘哲希 安博德 高佳琦^{**})

中美战略竞争以及美国的盟友政策影响着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2025 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征收“对等关税”、调整援助乌克兰政策，并加大遏华力度。作为美国在欧洲的重要盟友，英法德对美国政策的反应以及对华关系的演变，是衡量中国外交环境变化的晴雨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数据显示，近一年，双边高层交往与经贸接触在稳定中英、中法、中德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安全领域，三国在俄乌冲突及涉华议题上对华立场趋于强硬，联美频繁发声，这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形成掣肘。特朗普第二任期迄今，中英关系分值小幅上升，中法、中德小幅下滑。综合三国与中国的合作、分歧以及对美追随程度的差异，预测组认为，从关系类型来看，未来一年(2025 年 9 月至 2026 年 8 月)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原有的关系性质将不会改变；^①从分值变化来看，中英经贸关系的积极势头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下国际领导力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167)的部分成果，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创新项目：青年项目(项目编号：3162025ZYKD03)资助。

^{**} 刘哲希，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讲师；安博德，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高佳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根据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库对国家双边关系类别的划分标准，当分值处在-3~0 区间时，双边关系等级为“不和”；当分值在 3~6 区间时，双边关系等级为“良好”。在等级内部，又分为“低等”“中等”和“高等”三类。本文认为，中英关系将继续处于“不和”区间，中法关系将继续处于“高等良好”区间，中德关系将继续处于“中等良好”区间。参见阎学通等：《中外关系鉴览 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国际政治科学》2025 年第 10 卷第 4 期(总第 40 期)，第 219—232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难抵政治分歧,法德对美不满亦未转化为对华靠近,三对关系分值将在短期内延续现有趋势后走向稳定。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关系的变化与影响因素

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关系总体较为平稳(如图1所示)。2025年1月至7月,中英关系小幅上升,双边关系性质由“紧张”趋于“稳定”;中法关系在4月、6月因法国负面涉华表态而出现两次下滑,但双边关系性质仍为“高等良好”;中德关系在3月、4月、6月因德国负面涉华表态均有小幅下滑,5月高层交往推动中德关系回升,双边关系性质仍为“中等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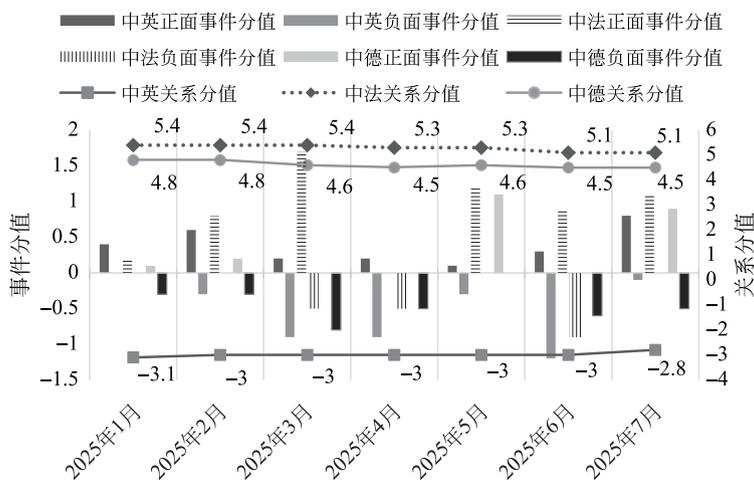


图1 2025年1月—2025年7月中英、中法、中德关系分值

从影响双边关系变化的因素上来看(如图2.1~2.3所示),一方面,高层交往是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双边关系正面事件的主要来源。高层交往与经济合作是中英、中德关系上升的主要动力。以中英财金对话、中英战略对话为代表的机制对话重启,各层级交往日益频密,中英关系出现质的改善。2025年5月,中德各层级领导人多次通电话、会谈,就双边合作、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当月中德关系出现小幅上升。中法、中德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合作也有助于双边关系保持稳定。2025年1月,中国外交部拉美司司长张润应约同德

国外交部政治三司司长布克会谈,双方就拉美事务及各自对拉政策等深入交换意见;3月,中法在《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之际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7月,中法就伊朗核问题交换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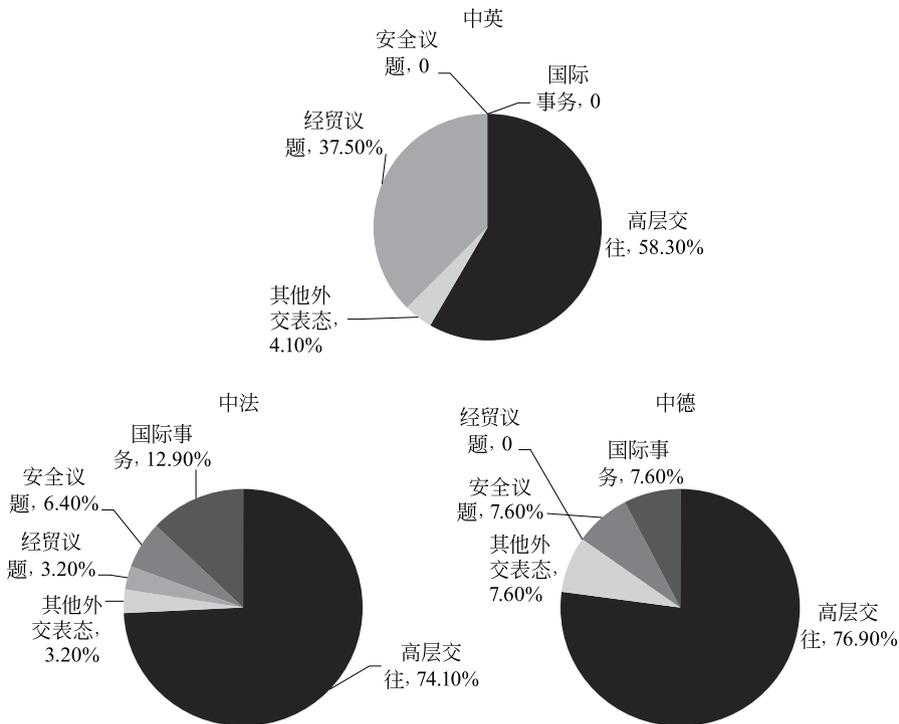


图 2.1~2.3 2025 年 1 月—2025 年 7 月中英、中法、中德正面事件分布

另一方面,涉华负面表态(如图 3.1~3.3 所示),特别是三国与美国联合进行的负面表态是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双边关系负面事件的主要来源。在各国单独涉华负面表态方面,2025 年 3 月,德国媒体炒作“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导致中德关系出现下滑。6 月,英国发布《战略防务评估》并将中国描述为“复杂而持续的挑战”。^① 在联美涉华表态方面,2025 年 3 月,七国集团(G7)外长会发表联合声明和“海洋安全与繁荣宣言”,就台海、南海等涉华议

^① Al Jazeera Staff, “UK Prepares for War: How Much Will It Cost?” *Al Jazeera English*, June 4,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6/4/uk-prepares-for-war-how-much-will-it-cost>, 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5 日。

题发表负面表态。4月,G7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就台海问题发表负面表态,当月中法、中德关系均有下滑。6月,G7峰会就系列涉华议题发表负面表态,当月中法、中德关系均有下滑。此外,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在经贸领域存在摩擦。英国、德国均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阻碍双边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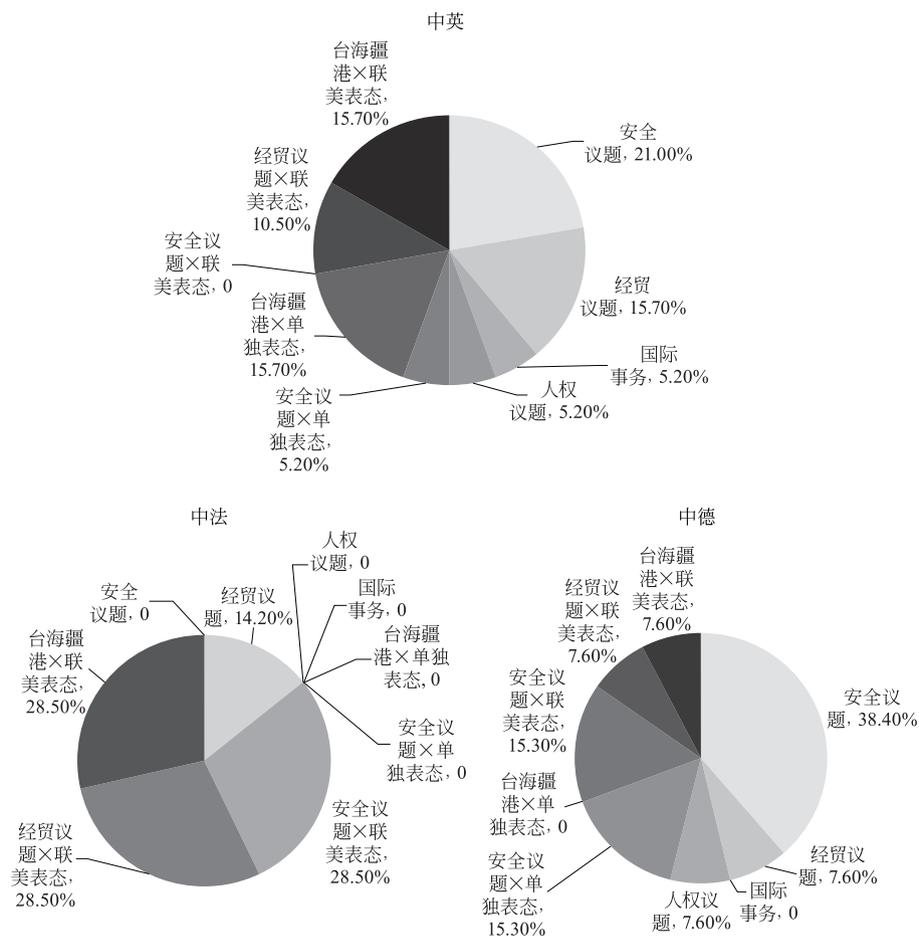


图 3.1~3.3 2025 年 1 月—2025 年 7 月中英、中法、中德负面事件分布

二、经贸议题推动中国与英、法、德关系发展的作用与限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其单边主

义倾向,促使英法德三国在经贸领域与中国加强接触,但是三国与中方的互动结果呈现明显差异——2025 年初中英就多项合作达成共识,双边经贸关系趋于稳定;而在中欧峰会中,中国与法德两国之间的分歧则较为突出,这为中国与两国的双边关系发展带来挑战。

美国关税政策持续变动为全球经贸环境带来了显著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英法德等国积极寻求应对之策。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原则,延续了第一任期对华加征关税的做法,于 2025 年 4 月 2 日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该举措加剧了美国与其传统盟友之间的贸易摩擦。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法德两国于 4 月 9 日投票通过首轮对美关税反制措施,计划对部分美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但在美国暂缓新增关税后,欧盟也暂停了反制行动。^① 随后数月间,英、欧盟分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2025 年 5 月 8 日,美国和英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同意撤回特定领域关税。^② 7 月 29 日,美欧就贸易协议框架达成一致,美国将对所有欧盟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③ 这一系列动态表明,在美国“对等关税”的政策压力下,英法德等美国传统盟友最终选择了部分妥协与退让。

在美国的关税施压下,英法德三国并未全面追随美国的政策导向,而是在审慎处理对美贸易的同时,积极拓展与中国的合作空间。三国在密切关注美国政策动向及与美谈判的同时,均表现出对华合作的意愿,并在不同层面推进与中国的对话与协作。英国较早启动与中国的对话,并取得多项务实成果。2025 年正值中英建立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 1 月举行的第十一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双方共达成 69 项合作成果,涉及金融开

① Peggy Corlin, “EU Member States Agree First Wave of Retaliatory Tariffs,” *Euronews*, April 9, 2025,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5/04/09/eu-member-states-agree-first-wave-of-retaliatory-tariffs>, 访问时间:2025 年 4 月 20 日。

② “UK-US Trade Deal Kicks into Gear: Immediate Tariff Cuts for UK Auto and Aerospace Sectors,” GOV. UK, June 30, 20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us-trade-deal-kicks-into-gear-immediate-tariff-cuts-for-uk-auto-and-aerospace-sectors>, 访问时间:2025 年 7 月 8 日。

③ Sarah Smith, “EU and US Agree Trade Deal, with 15% Tariffs for European Exports to America,” *BBC News*, July 28,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x2xylk3d07o>,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7 日。

放、贸易、投资、农业及绿色金融等多个领域。^① 5月,中英人工智能对话在北京举行,进一步深化了两国在新兴领域的交流。^② 法德也多次传达对华合作的意愿,并在具体领域推动合作进程。2025年5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法国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友,同时也是中国的朋友。尽管法国和中国有时存在分歧和竞争,但依然会开展合作。^③ 同月,双方在第十次中法高级别财金对话期间就禽肉贸易等议题签署合作文件。^④ 2025年5月,德国总理默茨也明确表示中国仍是“重要的合作伙伴”。^⑤

与此同时,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在政治和战略层面高层互动的规格或频次显著提升。2025年4月,英国贸易大臣与英国军方负责人访华,这是2015年来英国军方高级代表首次访华。^⑥ 2025年7月,王毅先后会见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均表达了加强政治与经贸合作的意愿。^⑦ 这一系

① “2025 UK-China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ialogue: Policy Outcomes,” GOV. UK, January 11, 20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2025-uk-china-economic-and-financial-dialogue-policy-outcomes/2025-uk-china-economic-and-financial-dialogue-policy-outcomes>, 访问时间:2025年4月12日。

② Chen Qingqing and Liu Caiyu, “Germany’s New Chancellor Delivers Inauguration Address, Stance on China Policy ‘Contradictory,’” *Global Times*, May 15, 2025,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505/1334164.shtml>, 访问时间:2025年5月18日。

③ “Macron Calls for ‘New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U and Indo-Pacific Countries,” *France 24*, May 30, 2025, <https://www.france24.com/en/asia-pacific/20250530-live-france-s-macron-addresses-global-security-forum-in-singapore>, 访问时间:2025年6月3日。

④ 新华网:《何立峰与隆巴尔共同主持第十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2025年5月15日, <https://www.news.cn/20250515/a22a130f7ee849bbb0bd718306828267/c.html>, 访问时间:2025年7月3日。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英举行人工智能对话》,2025年5月20日, https://www.mfa.gov.cn/wjdt_674879/sjxw_674887/202505/t20250520_11629125.shtml, 访问时间:2025年6月18日。

⑥ “UK Trade Minister Visits China at Same Time as Head of British Military,” *The Guardian*, April 10,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25/apr/10/head-of-british-military-tony-radakin-visits-china-for-first-time-since-2015>, 访问时间:2025年6月12日。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王毅》,2025年7月5日, https://www.mfa.gov.cn/wjzbzd/202507/t20250705_11665860.shtml, 访问时间:2025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德国总理默茨会见王毅》,2025年7月4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d/202507/t20250704_11665523.shtml, 访问时间:2025年7月10日。

列互动表明,尽管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英法德三国仍在策略性地维持与中国的多维度接触,力图在平衡中美关系的同时拓展对华合作空间。

然而,中国与英法德三国的贸易接触成效呈现明显差异。英国较早与中国、美国分别达成合作共识,但在领域选择上相对谨慎。2025年1月,中国和英国开展了第十一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并发表政策成果文件。^①然而,英国在电动车领域、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对与中国合作及中方投资持审慎态度。依据《国家安全与投资法》,英国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的投资进行严格审查。^②

作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国,法德两国更倾向于通过欧盟推进战略自主或拓展其他合作伙伴。其中,法国谨慎处理对华合作,公开表达对中国产业产能规模和经济竞争力的关切。2025年7月,在中欧峰会召开前夕,法国财政部长埃里克·隆巴尔呼吁欧洲设置关税壁垒,以防止中国扼杀欧洲工业。而德国新任总理默茨对华合作的态度为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更强的不确定性,^③德国则明确表示,将以欧盟为优先平台应对美国压力,默茨表示将继续推行“战略性降低风险”政策,旨在减少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④2025年7月召开的中欧建交峰会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与欧盟在经贸领域的分

① “2025 UK-China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ialogue: Policy Outcomes,” January 11, 20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2025-uk-china-economic-and-financial-dialogue-policy-outcomes/2025-uk-china-economic-and-financial-dialogue-policy-outcomes>, 访问时间:2025年4月12日。

②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Act: Details of the 17 Types of Notifiable Acquisitions,” GOV. UK, February 6, 202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ational-security-and-investment-act-guidance-on-notifiable-acquisitions/national-security-and-investment-act-guidance-on-notifiable-acquisitions>, 访问时间:2025年6月10日。

③ William Horobin and Francois De Beaupuy, “France Urges Tariff Barriers to Stop China From Killing Industry,” Bloomberg, July 5, 20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7-05/france-urges-tariff-barriers-to-stop-china-from-killing-industry>, 访问时间:2025年7月12日。

④ Chen Qingqing and Liu Caiyu, “Germany’s New Chancellor Delivers Inauguration Address, Stance on China Policy ‘Contradictory’,” *Global Times*, May 15, 2025,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505/1334164.shtml>, 访问时间:2025年5月18日。

歧。尽管中欧双方签署了气候联合声明,但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新技术协同开发及市场准入等问题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① 为增强经济韧性与战略自主性,欧盟积极拓展与墨西哥、印尼、日本等国的经贸合作。^②

总体来看,未来一年内,中国与英法德三国的经贸合作难以推动双边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善。尽管三国均在贸易领域与中国保持接触,但不同双边合作发展前景迥异:中英经贸关系短期内存在一定稳定空间,但英国对美安全依赖较强,通过深化对华合作对冲美国压力的意愿有限;法德两国与中国的合作则受限于中欧整体合作进程迟滞的大背景;加之三国皆在持续推进贸易多元化战略,这使得经贸往来难以正向赋能中国与三国关系的发展。

三、俄乌问题与涉华议题约束中国与英、法、德关系的发展

在影响中英、中法、中德关系的诸多因素中,俄乌冲突与三国就涉华议题的表态是两个关键维度。总体而言,三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与中国存在立场分歧,在涉华问题上表现出联美倾向,这共同制约了双边关系的改善。

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与英法德等欧洲盟友出现分歧。^③ 在对乌援助方面,美国摇摆不定。2025年

① Sam Mcneil And Ken Moritsugu, "Europe and China Agree to Take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Nothing Else in Tense Beijing Summit," AP, June 24,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european-union-china-trade-summit-beijing-0f2f0b67435b88a78adef3aa001d0099>, 访问时间:2025年8月7日。

② 越通社:《印尼与欧盟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2025年7月15日, <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44871.vnp>, 访问时间:2025年8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欧盟与墨西哥达成现代化全球协议》,2025年2月20日, <https://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e/t/202502/20250203565414.shtml>, 访问时间:2025年8月9日;Sam "EU-Japan Summit, 23 July 2025 Main Results,"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June 23, 202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meetings/international-summit/2025/07/23/>, 访问时间:2025年8月7日。

③ Vladimir Isachenkov, "Trump's call with Putin ends U. S. efforts to isolate Russia," AP News, February 14,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russia-trump-putin-ukraine-war-32f3b815693df3485b086e647d2e26f7>, 访问时间:2025年6月11日。

3月特朗普政府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①4月,特朗普政府又与乌克兰签署了矿产合作协议,释放支持信号。^②在对俄制裁方面,特朗普政府决心不足。2025年8月阿拉斯加峰会前,特朗普一度威胁对俄制裁以促成停火,会后却否认停火是达成和平协议的必要前提,令欧洲盟友质疑其偏袒俄方。^③

与美国的政策摇摆相比,英法德三国整体上持续支持乌克兰,但在应对美方立场变化时展现出不同策略倾向。三国均加大了援乌力度,并支持通过多边机制强化战后安全保障。在军援方面,三国在2025年以来都宣布持续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④在安全保障方面,英法于2025年3月伦敦乌克

① 新华网:《美国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2025年3月4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304/c497644650a54108ba66bdf625bf0ece/c.html>,访问时间:2025年6月12日;新华网:《美国暂停同乌克兰分享情报》,2025年3月6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306/e72b41f95f7f49648e9db4defb4e9d4f/c.html>,访问时间:2025年6月12日。

② “The Full Text of the US, Ukraine Minerals Agreement,” *The Kyiv Independent*, May 1, 2025, <https://kyivindependent.com/the-full-text-of-the-us-ukraine-minerals-agreement/>,访问时间:2025年7月10日。

③ Andrea Shalal et al., “Trump Threatens ‘Severe Consequences’ If Putin Blocks Ukraine Peace,” *Reuters*, August 1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trump-threatens-severe-consequences-if-putin-blocks-ukraine-peace-2025-08-13/>,访问时间:2025年8月30日;Emma Colton, “Trump Says Ceasefire Not Necessary for Peace during High-stakes Meeting with Zelenskyy,” *Fox News*, August 18, 2025,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trump-hits-back-ceasefire-not-necessary-peace-during-high-stakes-meeting-zelenskyy>,访问时间:2025年8月30日。

④ UK Cabinet Office, “Historic £1.6 bn deal provides thousands of air defence missiles for Ukraine and boosts UK jobs and growth,” Press Release, March 2, 20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historic-16bn-deal-provides-thousands-of-air-defence-missiles-for-ukraine-and-boosts-uk-jobs-and-growth>,访问时间:2025年6月12日;“France to Provide 2 bn Extra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Macron Says,” *Reuters*, March 26,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france-provide-2-bln-euros-extra-military-aid-ukraine-macron-says-2025-03-26/>,访问时间:2025年6月12日;Sasha Vakulina “Germany to Jointly Produce Long-range Weapons with Ukraine, Friedrich Merz Says,” *Euronews*, May 28, 2025,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5/05/28/germany-to-jointly-produce-long-range-weapons-with-ukraine-friedrich-merz-says>,访问时间:2025年6月12日。

兰峰会上提出组建“志愿联盟”(Coalition of Willing),旨在协调欧洲国家援乌行动,并在未来的和平协议中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①然而,英国与法德之间仍存分歧。英国倾向于对美协调,始终强调美国在冲突解决中的主导地位。在伦敦乌克兰峰会上,英国首相斯塔默倡议由欧洲起草和平方案并由美方推动。^②在8月的阿拉斯加峰会后,他甚至公开称赞特朗普“前所未有地拉近了战争结束的可能性”。^③相比之下,法国与德国对美国追随程度较低。在俄乌问题上,法德强调乌克兰在谈判中的地位,反对将其排除在外。^④在战略选择方面,马克龙多次强调欧洲应该加强防务自主,^⑤并提出将法国军费提高至GDP的3%以上。^⑥德国总理默茨也推动了“国防支出改革法案”。^⑦

① “Military Chiefs Gather in UK to Discuss Ukraine Protections,” *France 24*, March 20, 2025,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50320-military-chiefs-gather-in-uk-to-discuss-ukraine-protections>, 访问时间:2025年6月12日。

② George Parker et al., “Europe’s Rescue Mission on Ukraine: Keep Trump Engaged,” *Financial Times*, March 3,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40f6291c-83e1-4f0d-996f-34ed09eca175>, 访问时间:2025年8月30日。

③ “World Leaders React to Trump-Putin Summit Reaching No Deal on Ukraine,” Reuters, August 16,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world-leaders-react-trump-putin-summit-reaching-no-deal-ukraine-2025-08-16/>, 访问时间:2025年8月30日。

④ Solcyré Burga, “European Leaders Say Peace ‘Cannot Be Decided Without Ukraine’ In Message To Trump,” *Time*, August 10, 2025, <https://time.com/7308731/europe-ukraine-trump-putin-summit/>, 访问时间:2025年8月30日; “German Leader Says Peace Cannot Come at Ukraine’s Expense,” *AP News*, September 1,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germany-russia-ukraine-merz-e3a9e0651d4168a7623ae5fac6de10ba>, 访问时间:2025年9月1日。

⑤ “French President Urges Stronger European Defence Autonomy Amid Global Challenges,” *Anadolu Agency*, February 12, 2025, <https://www.aa.com.tr/en/europe/french-president-urges-stronger-european-defense-autonomy-amid-global-challenges/3456541>, 访问时间:2025年6月12日。

⑥ Laura Kayali et al., “Macron Turns the Screws on Ministers to Boost Defence Spending,” *POLITICO EU*, 13 Mar 202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mmanuel-macron-spending-minister-defense-donald-trump-us-france/>, 访问时间:2025年6月12日。

⑦ Sebastian Shukla et al., “Germany Is Unlocking Billions to Supercharge Its Military at a Seismic Moment for Europe,” CNN, March 23, 2025, <https://www.cnn.com/2025/03/23/europe/germany-military-investment-intl>, 访问时间:2025年6月12日。

总体而言,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政策摇摆,短期内推动法德两国强化对乌援助并追求防务自主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德两国调整对华政策、拓展对华合作留下空间。然而,法德在俄乌问题上对中方立场多有误读,甚至无端指责中国,将乌克兰局势与亚太安全议题相联系,反而使中法、中德关系回旋乏力。^①

在涉华议题与表态上,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将继续在台湾、南海、边界争端等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支持与中国争议的一方,挑战中国的利益主张。^② 英法德三国在这些涉华议题上仍然延续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

英国在涉华议题上高度追随美国,频繁联美或单独向中国释放消极信号。在联美表态方面,英国依托 G7 框架就台湾、南海、东海议题表明立场。例如,2025 年 6 月,G7 就东海、南海的所谓“破坏稳定活动”以及“市场扭曲”“产能过剩”表示关切。^③ 此外,英国还在涉疆议题上与美国协调立场,无端指责中方。^④ 在单独表态方面,英国在涉台、涉港议题上动作密集。例如,2025 年 3 月,英国政府于再次发布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干涉中国内政、抹黑香港特区人权法治。^⑤ 4 月,斯塔默对中国军队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

① Fanny Potkin et al., “France’s Macron Calls for Asian Coalitions as He Warns of US-China Divisions,” Reuters, 30 May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division-between-us-china-is-biggest-risk-confronting-world-now-frances-macron-2025-05-30/>,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 年 7 月 21 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记者会》,2025 年 7 月 21 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507/t20250721_11674365.s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6 日。

② 周建仁、王淇:《2025 年中美关系恶化趋势难以逆转》,载《国际政治科学》,2025 年第 1 期,第 200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 年 6 月 18 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记者会》,2025 年 6 月 18 日,https://www.mfa.gov.cn/fyrbt_673021/202506/t20250618_11652470.s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9 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 年 2 月 28 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2025 年 2 月 28 日,https://www.mfa.gov.cn/fyrbt_673021/202502/t20250228_11566157.s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9 日。

⑤ “Boost to UK Defence and Trade as Carrier Strike Group Arrives in the Indo-Pacific,” GOV. UK, June 17, 20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boost-to-uk-defence-and-trade-as-carrier-strike-group-arrives-in-the-indo-pacific#:~:text=,as%20we%20demonstrate%20warfighting%20capability>,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7 日

演训表示“关切”。^①

法国同样在 G7 框架内与美国联合表态,并通过单独行动持续强化其在“印太”事务中的存在感,压缩了中法关系的外交空间。在南海方面,2025 年 2 月,法国与美日派出“戴高乐”号航母、“卡尔·文森”号航母和“加贺”号航母在菲律宾以东海空域举行了“2025 太平洋斯特勒”海上联合演习。^② 4 月,法国又观摩美菲澳联合军演,并计划向菲律宾提供 40 艘海巡船。^③ 在台湾问题上,马克龙在 2025 年 6 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公开将台湾与乌克兰类比,将中国定性为地区“风险”,在南海问题上影射“中国威胁”,并暗示北约有理由介入亚太事务,引发中方严正驳斥。^④

德国在 G7、欧盟等多边场合,频繁参与对中国不利的联合声明,维持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例如,2025 年 4 月,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中国在台湾地区周边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表示关切。^⑤ 同月,G7 外长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国在台湾地区周边的演习“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威胁全球安全与繁荣”。^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馆:《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国首相与新西兰总理联合声明涉台错误言论答记者问》,2025 年 4 月 24 日, http://gb.china-embassy.gov.cn/lcibt/sgryr/202504/t20250424_11602906.htm, 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12 日。

② Embassy of France in the US, “France, USA and Japan Take Part in Multinational Exercise ‘Pacific Steller’,” Press Release, February 7, 2025, <https://franceintheus.org/spip.php?article11649>, 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12 日。

③ Liz Lagniton, “Philippines to Acquire 40 Fast Patrol Craft from France,” *Maritime Fairtrade*, May 26, 2025, <https://maritimefairtrade.org/philippines-to-acquire-40-fast-patrol-craft-from-france/>, 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12 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 年 6 月 4 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2025 年 6 月 4 日, https://www.mfa.gov.cn/fyrbt_673021/202506/t20250604_11640760.s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9 日。

⑤ EEAS Press Team, “Taiwan: Statement by the Spokesperson on China’s Military Drills,”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April 1, 2025,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taiwan-statement-spokesperson-china%E2%80%99s-military-drills-0_en, 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12 日。

⑥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China’s Large-Scale Military Drills Around Taiwan,” Press Release, April 6, 2025, <https://www.state.gov/g7-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on-chinas-large-scale-military-drills-around-taiwan>, 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12 日。

在单独表态方面,虽然德国相对其他国家较为克制,但仍借由新冠肺炎有大流行起源信息调查、间谍活动等事件无端指责中国,引发中方严正驳斥。^①

总体来看,英法德三国在涉华议题上的表态对三国与中国的关系均产生了持续性负面影响,但其政策逻辑与具体选择存在显著差异。英国对华姿态最为强硬,全面配合美国战略部署,不仅在台湾、南海等敏感议题上频繁施压,还积极介入“印太”安全事务,释放明显的战略制衡信号。法国一方面强化其“印太”存在感和涉华负面表态,另一方面推进战略自主,以避免过度依赖美中任何一方;然而,其在台海、南海问题上的言行,如将台湾问题类比俄乌危机,显著压缩中法外交空间。德国则较为谨慎务实,其涉华表态虽在多边框架内与西方保持一致,但在双边层面致力于维持对华关系的稳定性。

四、结语

特朗普再度担任美国总统后,在经贸和安全领域对各国施压,这为中国与美国的传统盟友——英法德三国的关系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经贸领域,为应对全球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英法德三国寻求与中国深化接触;在安全领域,英法德三国在俄乌问题与涉华议题上与中国的分歧,限制了中国与三国关系的发展。虽然以上两类因素共同影响了三对关系,但是三国对美追随程度的不同导致上述因素对三对关系的影响具有差异。其中,英国虽与中国展开了一定的经济合作,但是其对美追随程度较高,在涉台等中国内政议题上与美国的协调程度最高;法德两国虽趋于追求美国联盟体系之外的战略自主,但在对华贸易合作细节与俄乌冲突议题上仍与中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外交部发言人就德媒有关报道答记者问》,2025年3月13日,https://de.china-embassy.gov.cn/sgyw/202503/t20250313_11574407.htm,访问时间:2025年8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2025年1月10日,https://de.china-embassy.gov.cn/sgyw/202501/t20250111_11531229.htm,访问时间:2025年8月9日。

方存在分歧。结合英法德三国与中、美的共识及矛盾,未来一年内(2025年9月至2026年8月),英法德与中国原有的关系性质难以发生改变——中英、中法、中德关系将继续处于“不和”、“高等良好”、“中等良好”区间;三对关系分值的走向将在短期内延续其原有趋势,中英关系在小幅上升后走向稳定,中法、中德关系则将在小幅下滑后走向稳定。